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落地实践(1918—1921)

## ——基于知识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汪娜娜, 王志辉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将“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社会活动进行考察,可以看到知识建构为现实的过程落实为三重层面:一是以学会、研究会等“组织”为中心,接触、学习、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凝聚为意识形态共同体;二是以报纸杂志所构建的“语言”为中心,知识群体借助文本载体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以建构知识正当性;三是以学校等“空间”为中心,在传播过程中联合社会各阶层并作“实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力。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落地实践,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知识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A8;G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5-0021-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03

## The Implementation Practice of Marxism in Its Early Spread in China(1918—1921):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ANG Na-na, WANG Zhi-hu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s a social activity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we can figure out how theory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reality at three levels. Firstly, centered around “organizations” such as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societies, an ideological community was formed by the intellectuals who started out to learn, understand and apply Marxist theory. Secondly, with the “language” construct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s the center, these pioneers introduced and explained Marxism with the help of text carriers so as to make Marxism legitimate. Thirdly, with the “spaces” such as the schools as the center, these intellectuals jointly engaged with various social strata, taking practical action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volution during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Reflect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actice of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can provide insightfu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the Party’s publicity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rxism; the early sprea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0szzx02)

**作者简介:**汪娜娜(1988—),女,安徽桐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王志辉(1997—),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新闻史。

以 1918 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迈入了“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sup>[1]</sup>阶段。五四前后各类思潮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最终在这场思想博弈中脱颖而出,短短数年间从“纸上的观念”进化为“行动中的现实”。这一历史飞跃不仅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sup>[2]9</sup>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从一种“舶来”的知识逐渐建构为强大的社会现实的过程。知识社会学是一种有关知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的经验理论<sup>[3]</sup>,其任务在于理解社会现实的建构方式<sup>[4]24</sup>。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社会活动过程进行考察,关注“知识如何落地”这一根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在五四前后实现的阶段式跨越提供一份新的注解。

## 一、以“组织”为中心构建意识形态共同体

### (一)建立组织是“知识落地”的基础

格尔茨认为,观念或思想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载,“必须有人尊崇、赞美、维护、贯彻它们”,从而在社会中成为“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如此才能发挥出强大的社会作用<sup>[5]</sup>。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规范化、制度化推进,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的支撑。

早期的学会、研究会等组织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著述进行学习、研究、翻译等活动。李大钊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一方面大量增加了馆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其中包含大量英、法、德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另一方面组织青年学生在图书馆进行阅读和研讨。后来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邀请“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成为该会会员<sup>[6]</sup>。研究会从十几人发展至二三百人,搜集了百余种中外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及有关书刊,并组织懂外文的会员开展翻译工作,编

译“康慕尼斋丛书”“列宁丛书”“马列主义丛书”等。1920 年 5 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等人在上海也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前者遥相呼应。除这两地外,1918 年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1919 年周恩来、马骏在天津发起觉悟社,1920 年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建立励新学会等。流动的知识突破了地域限制,以实体化的组织为依托,为这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架构起信仰的桥梁。

1921 年 3 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呼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应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如此才能推进“彻底的大改革”<sup>[7]</sup>。这里的“组织”指向的不仅仅是人的集合,更是超越个体性的“政党精神”、团体的凝聚力与行动力。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期待的“强固精密”的组织,既是作为政治行动工具而起作用的实体化组织,同时也表现为凝聚成组织原则与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因此,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研究会在组织建设方面进一步增强,新民学会“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对团体的“目的、方法、如何着手”做详细讨论,确定了办学校、推广文化书社、办通俗报等基本事业的方向<sup>[8]29</sup>,并在制度架构方面已经具备了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sup>[8]160</sup>的共产党组织的雏形,由最初的学术性团体逐渐进化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sup>[8]17</sup>为目标的政治性团体。在社团组织林立的五四时期,对组织严密性与纪律性的高度追求,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石的社团组织最为鲜明的特质。

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往来书信中,对如何建立组织进行过深刻的讨论。蔡和森结合对苏俄革命的观察与思考,总结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利器”,即党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工团为革命军与生产组织、合作社为消费组织、苏维埃为政治组织。其中党的组织尤为迫切和重要<sup>[8]128-131</sup>。在另一封信中蔡和森又进一步总结出党的组织步骤有四:一是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二是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三是严格地物色

党员;四是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sup>[8]161</sup>。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对这些主张“没有一字不赞同”,并透露出刊物方面已发行“旗帜鲜明”的《共产党》月刊<sup>[8]163</sup>。蔡和森反复强调“有力的出版物”,认为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发挥研究与宣传的功能,更是建党的先决条件。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共产党》月刊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塑造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立场的组织价值观,建构了中共早期党员的组织认同<sup>[9]</sup>。“有力的出版物”凝聚了组织成员之间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推动形成了意识形态共同体。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组织”的认识与筹划开启了建党的序章

“五四”之后的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建党问题并非偶然,一方面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和初步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即在组织准备方面,通过前期各类社团组织的运作,他们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来华指导建党工作的维经斯基在1920年6月的一封信里指出,当时“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中心组织”<sup>[10]</sup>。1920年下半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成立,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法国和日本也建立了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样板建立起来的,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构成了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sup>[11]</sup>。

通过营造兼具“团体组织”与“政党精神”的意识形态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传播实现了“知识”与“人”在实践层面的汇合,从而触发了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引导的一系列社会行动。

## 二、以“语言”为中心构建知识正当性

知识社会学者指出,在建构客观现实的过程中,为了使制度秩序持续传递,“正当性”(legitimation)问题必然要出现,即需要进行解释和证明<sup>[4]116</sup>。“正当性的大厦建立在语言之上,以语言为主要媒介。”<sup>[4]83</sup>经验、意识通过语言来界定与传递,进而形成社会共享的知识库,让

更多的人得以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形成的“语言”,即体现为如何在中国本土的舆论环境中介绍、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出“解释和证明”的功能,以建构知识正当性。五四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经历过三次论战,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正体现出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愈来愈完善、丰富。这种“语言”的发展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 (一)具有体系完整、计划性强的特征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学说介绍和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兴起。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首先刊载了《共产党宣言》节译稿,《晨报》《新青年》创立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一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丛书相继问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诠释。以1920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分别对应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联络起这三大理论,因此判定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sup>[12]18-19</sup>。另外杨匏安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的历史观为经,以革命的思想为纬”<sup>[13]</sup>,李汉俊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sup>[14]</sup>等论述,均体现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把握,区别于此前国内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群体所做的碎片化介绍甚或曲解。另一方面是中共早期出版机构有计划地发行马克思主义出版物。1920年8月《新青年》编辑部同人创办了新青年社,除了发行面向劳动大众的《劳动界》《上海伙友》等通俗刊物外,还出版了《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书籍,对进步青年影响很大。1921年9月,中共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15种“马克思全书”、14种“列宁全书”等共计59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sup>[15]</sup>。虽然这些计划未能全部完成,但统计显示1921年底至1922年上半年有17种全书和丛书得以出版<sup>[16]</sup>。以上这些出版信息透露出早期马克思主

义传播者对马恩、列宁等人的重要著作有了整体性了解,以此为基础策划了有条理的传播计划。

## (二)具有与中国本土“实境”相呼应的特征

“五四”时期大量东西方思想文化被引入国内,而真正决定这些外来知识“面貌”的是本土知识分子,他们在实践中构建这些知识的意义与关联性,使之成为与本土的、具体的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sup>[17]</sup>。面对纷杂的各类主义、学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强调实用性。陈独秀认为判断一种学说有没有传播的社会价值,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sup>[18]</sup>。李大钊则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也并非空谈,而是能够凝聚起多数人的一种共同趋向,需要变作实际的形式来满足现实的需要;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能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就必须研究怎么“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sup>[12]1-3</sup>。当马克思主义学说辗转传入中国,正在苦苦追寻“实用的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敏锐地认识到,这就是一种既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也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实践哲学。

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境”体现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各种“旧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sup>[2]4</sup>。为了形成与“实境”相呼应的语言,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重新的思考与阐释。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本土环境相结合,首先需要对一些理论前提进行调整。例如马克思赋予了城市无产阶级以历史主体的角色,但当时中国的工业部门仍处于襁褓阶段,对此李大钊提出,帝国主义对中国产业的压迫和剥削与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工具、夺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大同小异,因此,“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sup>[12]144</sup>。李大钊通过对理论前提的巧妙诠释,将中国以“无产阶级民族”的身份,稳稳地放置到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场域里<sup>[19]</sup>。

理论层面进行调适后,早期传播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例如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新青年》上,可以看到李大钊在《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

原因》(第7卷第2号)中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指出孔子思想已不能适应中国新经济形态下的现代社会;陈独秀在《对于时局的我见》(第8卷第1号)中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角度,揭露出军阀的本质与资本家一样,都是剥削劳动大众的统治者;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第9卷第1号)中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阐明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本质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必须要扫灭资本主义才能让劳动者获得真正的解放,有力地批驳了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调。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读未必精准,但已形成了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应用于实际的话语实践。

## (三)具有可借鉴的“经验型”特征

正是对应用于“实境”的知识的需求,苏俄革命经验逐渐得到国人的注目。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并没有立即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演进,特别是“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国内的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热情才渐渐高涨起来,一批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俄国与中国国情相近,列宁领导的阶级斗争经验作为一种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成功经验,“也可以适用于中国”<sup>[20]</sup>。

1919年11月,《晨报》开辟了“俄国研究”栏目,登载了《1919年旅俄六周见闻记》等文;1920年9月改组后的《新青年》开设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转载了位于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机关刊物《苏维埃俄罗斯》上的文章。来自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逐渐取代此前主要来自日本的同类文献,发挥出显著的影响。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派瞿秋白、俞颂华等人赴俄考察并撰写通讯,力图向国内报道准确的苏俄状况。将访俄经历著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瞿秋白说过,之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就是希望找到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方法,“尽一分引导中国新生路的责任”<sup>[21]</sup>。苏俄革命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理想已经从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具有改变世界的强大效力。

因此,苏俄革命经验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一种鲜活的语言,表明马克思主义兼备“理论的彻底性”与“物质的力量”。

以体系完整且有计划的、实用的、经验型的语言为中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大范围的持续传播,逐步由少数知识分子掌握的“真理”扩散为可共享的公共知识,影响力逐步扩大。

### 三、以“空间”为中心作“实际运动”

《劳动音》周刊在1920年11月创刊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运动,结果还是空谈。”<sup>[22]</sup>面向广大的无产阶级作“实际运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具体实践必须突破狭隘的空间限制,让知识蔓延到流动的社会空间中。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知识的空间化是知识建构成科学的重要因素。空间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经由社会建构而成,像“纪律”这一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其实现路径之一就是空间的分配入手<sup>[23]</sup>。考察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切实效果,需要关注由空间所推动的知识的生产性实践及其进而形成的向社会延伸的秩序力量。

作为一种典型的强调纪律性的制度空间,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促进了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主要开展俄语教育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研读。成员各地进步组织介绍,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党团活动。同年,北京大学也在政治系等部门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以北大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形成了向全国辐射的传输网络,并以各大学的青年团为依托形成了接收站和传播点,如张太雷等人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的社青团,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大学成立的社青团等。《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等书籍、《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刊物成为各地学校青年团共同的学习与交流资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各大学扎下了根基,推动了青年学生群体的思想转化与革命实践。

学校同时面向广大的工人群众。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这种结合虽是一种必然,却也不能自发地实现,要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桥梁<sup>[24]</sup>。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由邓中夏、何孟雄等人组织,设常识、国文、数学等课程,其中常识课侧重介绍“剥削”“帝国主义侵略”“劳工神圣”“工人团结”等概念,随着课程的递进,还涉及工人阶级政党、工会组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等内容,授课知识逐渐地深入和系统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音》《共产党》也都在这个学校里出现了。受到鼓舞的工人人们在自编的《劳动大众歌》中唱道:“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兄弟,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sup>[25]</sup>这体现出他们对“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等概念已然十分熟悉。

除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之外,各地党小组也创办了类似这样的工人学校、自修大学和夜校。如上海党小组创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武汉党小组建立了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武昌第一纱厂识字班,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开办了民众学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当时的旅欧小组成员也在工厂和华工居住区建立了夜校。包惠僧回忆起在粤汉铁路徐家棚办校的经历时说到,在荒僻的地方开办那样一所学校,“好像是沙漠里出现了绿洲”。铁路工人从一开始的新奇,到逐渐接受了新知识的教育,再到后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直到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sup>[26]</sup>。这些面向工人的学校成为知识传播的中枢节点,以共同的革命信仰联结起遍布各地的工人群众,推动了现实中的工人运动实践。

此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了“农村”这一广袤空间的重要意义。李大钊倡导青年走向农村,因为在他看来农村的老百姓全无“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层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sup>[27]</sup>,需要青春的力量带去希望和光明。

《共产党》月刊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重申了农民在革命各时期占据的重要地位，与其“自然地慢慢进化，不如用点人为的方法来促进他”，这种促进的方法就是走向农村“设法向他们宣传”<sup>[28]</sup>。上海党小组在 1921 年 4 月派沈玄庐到浙江衙前村进行宣传和组织，并于当年 9 月成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此阶段面向农村的知识传播与组织工作虽然还处于初级的阶段，但已为后期系统的传播活动铺垫了基础。

五四时期不少先进知识分子都提出过联合广大民众的想法。例如 1919 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呼吁“民众的大联合”，奔赴“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sup>[29]</sup>；李大钊也曾发出“大联合”以“立下民治的基础”的愿望<sup>[12][137]</sup>。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去鼓动、黏合这些松散各处的社会成员呢？构建知识传播的空间即是一种重要的途径。学校等知识传播场所面向多元人群，消融了阶级、职业、区域、性别等因素的壁垒，使马克思主义思潮走向民众、涌入社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知识的理解、阐释与运用，在取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和支持后，逐渐演化为全民族的革命运动。

#### 四、结语

再回归到五四时期思潮纷纭的语境中去看，各类学说“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大多在流行一时后湮灭。例如无政府主义曾盛行一时，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纪律，“其思想活动也仍是以自我为中心并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改变的”<sup>[30]</sup>，因此其知识传播活动呈现出散乱和无序的状态，难以避免走向衰微的结果；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传播在“语言”层面显得无力，虽然以《解放与改造》《东方杂志》《觉悟》等期刊为宣传阵地，但更像是学术沙龙，主要停留在浅显的译介上，一经深入论战就暴露出理论知识的贫乏和说服力的欠缺；曾在城市中兴起的“新村”式“工读互助团”，试图组织理想的小社会，完成社会改造的设想，但这种局限在狭小社会空间中的浪漫主义设想，践行不久即宣告解体。当时的青年人从失败中认识到，城市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要

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sup>[31]</sup>。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sup>[32]</sup>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备知识优越性，同时也具有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巨大力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看到一种先进知识与当时的中国现实环境的交织融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过程不仅包含了传播者阅读、学习、阐释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知识运用于实践、建构为现实的历史征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股“能够作战的新势力”<sup>[33]</sup>，充分运用报刊、教科书、学校、学会等“制度性媒介”<sup>[34]</sup>，建立了秩序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并依靠广泛且坚固的各类组织机构去维持制度的稳定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从思想观念落地为现实革命的实践。相较于其他的思潮传播活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尤为注重“知识落地”：以建立“强固精密”的党的组织为核心基础，意识形态共同体得以凝聚；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力的“语言”为中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更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持续传递的社会公共知识；以学校等制度空间为知识传播的枢纽，联合社会各阶层开展实际运动。这些多元的落地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与中国的“实境”交相呼应，从而跨越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竞争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自此生根发芽、经久不衰。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落地实践，将有助于我们从来时的路中汲取历史经验，理解一种理论知识走向日常现实的内在逻辑，这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田子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4.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

- 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
- [3]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32.
- [4]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M].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5]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372.
- [6] 佚名.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N].北京大学日记,1921-11-17(4).
- [7]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7-79.
- [8]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9] 唐荣堂.建构组织认同:《共产党》月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新闻记者,2021(7):21-29.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8.
- [1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6.
- [12]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 杨匏安.杨匏安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152.
- [14] 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N].(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06-06(1).
- [15] 佚名.人民出版社通告[J].新青年,1921,9(5):广告页.
- [16] 上海革命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M].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1:137.
- [17] YE H W 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7.
- [18]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
- [19]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M].温洽溢,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403.
- [20] 无懈.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J].共产党,1920(1):2-13.
- [21] 瞿秋白.瞿秋白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7.
- [22] 佚名.《劳动音》介绍[J].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79(2):184-186.
- [23] 何雪松.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J].学海,2005(6):44-48.
- [24] 黄修荣.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286-287.
- [25] 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编委会.北方的红星: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六十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64-69.
- [26]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0.
- [27]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8-289.
- [28] 佚名.告中国的农民[J].共产党,1921(3):3-7.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12-359.
- [30] 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6.
- [31]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J].星期评论,1920(48):1-4.
- [32]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EB/OL].(2017-09-29)[2017-09-29]. [http://www.gov.cn/xinwen/content\\_5228629.htm](http://www.gov.cn/xinwen/content_5228629.htm).
- [33] 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56.
- [34]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J].二十一世纪,1999(4):19-39.

(责任编辑:白丽娟)